

Nick Platt 传授从业海上保险 40 多年的经验

在 Gard 工作了 40 多年的 Nick Platt 即将退休。我们有机会与他探讨理赔职业生涯以及他从中收获的一些经验教训。我们工作所涉及的技术一直不断改变，但在损失预防和事故响应中，人的因素对于保护人类、环境和财产而言，仍然是最重要的接触点。



20 世纪 70 年代初，Nick 在劳合社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，从事货物追偿工作。在那里，他遇到了 O. Kverndal & Co. 公司的 John Kendrick；当时，John Kendrick 作为 Gard 在伦敦的通讯代理，参与了相关案件的抗辩工作。Nick 认为，John 一定是在他身上发现了某种特质，因此请他转换角色并加入 Kverndals。1978 年，Nick 开始从事保赔理赔事业。

仅仅入职 Kverndal 几个月后，Nick 就在一起杂货船案中初试身手：该船在一次航程中因装货导致失去稳性，遭遇发电机故障并宣告共同海损，随后搁浅并再次宣告共同海损，并且最终卷入碰撞事故。令人悲伤的是，该案中的船长（即相关航程中的第四位船长）在船搁浅后自杀了。

“我非常幸运，John Kendrick 让我参与了许多起复杂而有趣的案件，因此，我只是倾听别人的话语，就很快学到了很多。” Nick 承认，这种学习方式在今天可能很难重现，因为重大事

故的发生数减少了。他强调，当复杂案件发生时，Gard 仍应重视让年轻人参与，并确保他们参与案件的整个处理过程。Nick 还建议，派年轻的理赔人员和更有经验的同事一起前往事故现场，因为这样能提供在办公桌前难以获得的经验。“一开始我并没有专业方面的资历，但我通过边做边学，获得了技能。学习和理解法律很重要，但懂得在实践中如何运用法律同样重要。”

20 世纪 80 年代，Gard 在 Kverndal 办公地点的隔壁开设了一家英国公司，由此带来了一些变化。在为邻四年后，Kverndal 被出售给了 Gard 英国；一夜之间，Gard 英国的员工人数翻番成了 8 人。如今，伦敦办公室已有近 50 名员工；与此同时，Gard 挪威阿伦达尔总部的员工人数已经从 22 人发展到 260 人！

我们借此机会采访了 Nick，听取了他对本行业的重要观察结果，以及他给予业界后代的建议。

航运业是高度规范的行业。规范在哪些方面改变了您在工作中注重的细节/事项？

今天，航运业受规范的程度远远高于 30 年前。这可能是有益的，因为如今船东经营船舶所依据的规范要有效得多。当今重大事件发生数的减少体现了这一点。

规范影响了船东的责任。保赔协会需要了解并理解各项规范。会员和客户也需要这么做，以免违反规范。理想情况下，协会应该对这些规范有一定的影响。例如，我本人曾参与国际保赔协会集团（IG 集团）污染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为期十年，其间我们有机会对影响污染问题的潜在新法规提出意见。IG 集团参与制定和推行了一项名为“RESPONSECON”的标准合同，供合约方应对污染事件时使用。各保赔协会还参与了与中国当局讨论在中国实施新污染法律的问题。

规范有国内规范，也有国际规范（通过 IMO 制定）。有些国家仅在国家层面作出规范。最大的挑战在于有些国家（例如美国）不仅只签署了少数的国际公约，而且还允许其国内各地区实施自己的（有时是互不相同）的法律。对于开展国际经营的船东来说，这不尽人意，而且会给合规带来困难。美国《1990 年油污法》（OPA）就是典型的例子。OPA 是联邦法律，在某些方面与国际污染公约（民事责任公约）的规定不一致。美国法律允许各州就此问题独立立法，这对船东造成了极大的困扰。

从索赔的角度来看，规范/公约的增多有没有让工作更轻松或更困难？

从理论上讲，国际公约会让工作更加轻松，原因是有了适用于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一致性、规范化制度。而挑战在于各成员国未能对公约进行一致解释和/或运用的情况。

举例来说，在“PRESTIGE”案中，西班牙最高法院就错误地解释/运用了民事责任公约的规定，做出了令人遗憾的判决。这可能就是 IG 集团请 IMO 成员国研究有否可能发布“致成员国的公约一致性解释指南”的主要原因。

我确信，Gard 外联（Outreach）项目是您（绝佳）的想法。您能描述一下该项目的内容，以及是什么促成了该项目吗？

在研究 Gard 及其他保赔协会处理过的重大事故时，我认识到，各国的救助及污染防治部门是事件中最为重要的主体。今天，各主管部门对相关工作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 30 年前。与它们开展建设性合作通常意味着会更有成效，而且坦率地说，更加便宜。

英国海上救捞与干预国务代表秘书 (SOSREP) 这一职位是在 1996 年 “SEA EMPRESS” 轮 (由 Skuld 提供保险) 案之后设立的。我们与 SOSREP 建立了联系，这一办法在当时具有变革性，但现在已被证明确实有效。这令我想到，与这样的人合作并与他们建立关系是有益的。人们通常会对先期接触过的对方做出积极的回应。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，不可能建立相互合作的有效工作关系。

外联项目自六年前启动以来，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。参与该项目的 Gard 同事和外部人士的反馈一直是积极的。在希腊和巴西发生的事故使我们有可能评估该项目的有效性。虽然很难精确地确定经济上的成效，但可以说，我们看到各国主管部门对 Gard 参与相关工作产生了一定的信任和满意度，并相信 Gard 的参与使其工作变得较为轻松。

一些离别时的感想

当放手让 Nick 迈向退休生活时，我们请他给年轻的保赔理赔人员一些建议。“希望曾与我共事过的人，从我这里学到了一些 (有益的?) 东西。我的职业生涯很难复制，但有些法则仍然很重要。随着我们越来越依赖技术，人的因素变得愈发重要。面对面会晤可收获更多裨益。尽管这并非每时每刻都奏效，也不是每种情况下都有效，但我仍然认为应该认识到，早期的和解会议可能会极其有价值，并且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客户和会员带来有利的结果。不必害怕早日会晤、早日和解。事事都有风险。电子邮件和电话很棒，但它们无法让我们实现面对面会议时的直接交流。我的最佳建议——就是互相交谈。”



作者：Erika Lindholm

理赔主管兼律师，赫尔辛基



作者: Hannah-Maria Opperman-Mäkinen
行政协调员, 赫尔辛基



作者: Danae Pispini
律师, 比雷埃夫斯



作者: Puja Varaprasad

理赔主管兼律师，新加坡